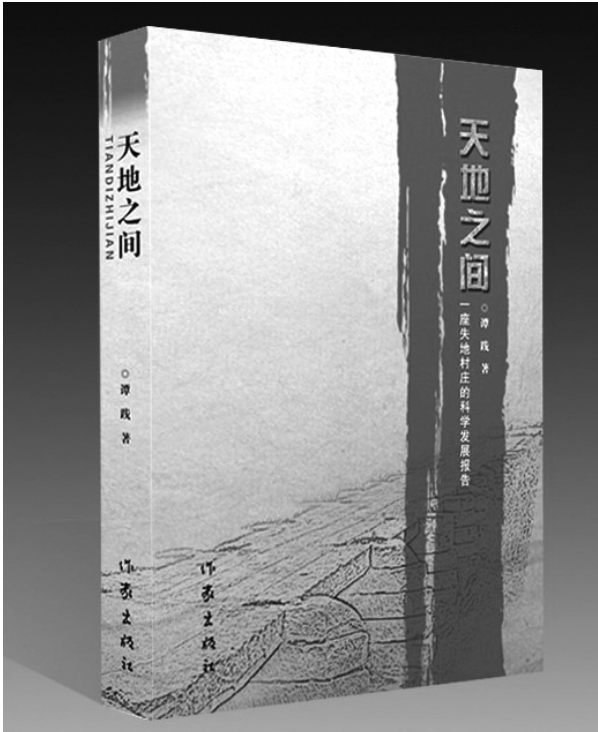


■报告文学

一座失地村庄的科学发展报告(节选)

□谭 跣



这是一部宣传正能量、弘扬主旋律的书。作者10年跟踪采访,三载精心创作,真实地再现了泰山脚下一个失地村庄——粥店十几年来艰难曲折的发展变化历程。三千个失去土地的农民,在以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刘梅元为班长的“两委”班子领导下,以坚忍不拔的毅力,从泥洋中抽出身来,励精图治,绝处逢生。而今,这里的学习坚持了10年之久,这里的孤寡病残老幼得到特别关爱,这里的创业者有足够大的舞台,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足、温文儒雅……

血腥一日

粥店村民和某些略知粥店根底的人,永远不会忘记村里发生的一件大事。

那是1992年8月7日。

一个年过半百的村民,以杀猪为业,通常农村把这类从业者叫做“杀猪匠子”或“杀猪的”,此人却另有一个外号“捆天月子”,意思是能耐很大,能够把天捆起来。这天中午,此人独自喝了一顿闷酒,勾起了心中一桩巨大伤心事——儿媳怀孕好几个月了,因不符合生育政策,村里动员着流了产,流下来一男婴。醉意朦胧中,他身着青衣,手提杀猪刀,赶往村委。此时还不到上班时间,天气燥热,树上蝉儿歇斯底里地叫着,当时分管计生的村委副书记孙玉林正在一个西瓜摊前跟摊主聊天,见了远远走过来的“杀猪匠子”忙招呼道:“二叔,坐坐吧。”二叔凑过来,倒背着手,支吾着,不坐也不说话,猛然挥刀向孙玉林砍来,孙玉林大惊,慌忙躲闪时,胳膊、肚子已中了三刀。孙玉林慌忙逃脱,杀猪匠子又闯进村委,将会计刺伤,转而回到村内计生主任宋其翠家,将其刺死,随后自杀……

一股血腥气骤然间笼罩了粥店。

一向默默无闻的粥店村因而“名声”大振。

时至今日,当我到孙玉林家中采访时,他仍然心有余悸。他说,夜里有时候梦到那天的场景,还会吓出一身虚汗。本来健壮结实的他,经过那一劫,身体完全垮了,成了医院的常客。

这一天是黑色的,是粥店村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。

这一天,将村干部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,谁都不愿干了。一时间,村委会院落变得冷冷清清,空空荡荡。秋风吹过,落叶飘零,严冬似乎早早地来到了粥店。

后来人们将这一天发生的事称之为“八七”事件。

村干部人人自危,村里工作陷于瘫痪。

粥店——猪圈？

村子乱成了一锅粥。

最大的“乱源”是土地调整。粥店村当时有人口2810人,耕地2396亩,其中小麦1740亩,果园656亩,鱼池30个,180亩。根据规定,村里每3年调整一次土地,由于个别村干部办事不公,多的是人情地、关系地,你和村干部关系近、交情好,就能分到好地,否则只能任凭摆布。村民意见纷纷,又无力改变,只能用消极办法以示抗议,有的不交提留,有的拖欠承包款,有的乱挖鱼塘……村里的党员会、村民代表会等各种会议,任你强调多么重要,硬是召集不起来。似乎人人窝了一肚子火,像被激怒的公牛,吵架的,斗殴的,骂大街的,处处点火,处处冒烟,真是乌烟瘴气,一团乱麻!村民看不到出路,看不到前途,只能自暴自弃,有几次投票选村干部,有些人竟然将票投给了村里几个“喇叭”(方言:傻瓜)。

几家小规模村办企业建筑公司、石灰窑厂、砖厂、家具厂等,因为管理不善,几乎全部亏损!全村贷款达50多万元,其中30万元已到归还日期,金融部门已多次催讨。村里无计可施,已决定变卖土地和家产了。

粥店村已接近崩溃的边缘!

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,无力投资公共事业,村里小学、幼儿园、卫生室等,全都破烂不堪,勉强维持。村中大小小街道,全都是土路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泞遍地。村西面设有集市,逢阴历的二、七开张,村子是必经之路,遇上雨天,四邻八乡来赶集的人一路走进村子,便不由得皱了眉头,千难万险地涉过了泥水,回头扔给粥店一个“荣誉”称号,啥粥店啊,干脆改名儿叫“猪圈”吧!

以前,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号,粥店人颇为气愤和不服;这次,连粥店本村人也觉得,这“猪圈”可真是名副其实啊!

新人出山

1993年和1994年,先后有两位党支部书记走上任,一位干了不足一年,一位干了一年多,却有半年多生病住院。这位书记是个大老粗,开会发言,得有人给他写材料,不认识的字,还得注上个“白字”。两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胜任,上级党组织只得着手再选,将全村党员来回扒拉了几遍(此时刘梅元还不是党员),竟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。

况并不太熟悉,工作一时无从下手。好在他遇到了一个好帮手,这个人便是村委副主任刘梅元,分管社会治安和民事调解,兼任村建筑公司副经理,干着两样工作,只拿着建筑公司一份报酬。早有人跟梁书记介绍说,刘梅元为人正派,善谋事,能成事,却行为低调,在哪儿都像一头老黄牛,脚踏实地,任劳任怨。此人无不良嗜好,却酷爱看报、学习,在建筑公司和村里威望很高……

他还更详细地了解到,刘梅元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和实践,拿到了建筑工程师职称——那时,农民评上工程师,还是很有场面的事儿。梁书记庆幸遇到了一位能够信任、可以依靠的人。在随后的分工中,村委工作由梁延平负总责,梁延平不在家时,由刘梅元代管政务。同时具体分管企业,并任治保主任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。这样,名义是副主任的刘梅元实际上履行着村委主任的职责。他以无私无畏的勇氣,全身心地在村里工作上,配合下派书记,使大乱之后的粥店获得了初步的休养生息。

1996年1月15日,村委换届选举,刘梅元被正式推选为村委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。此时,他还只是一位转正不久的中共新党员。

1997年3月22日,天边刚刚滚过第一声春雷,刘梅元又被任命为粥店村党支部书记。

在由上级党组织主持的权力交接仪式上,在“两委会”、全体党员大会上,刘梅元谦虚地宣布:“本人服从组织决定,但自感没有这个能力担此重任。在任期内一定团结其他同志,继续做好本村的各项工作,尤其是今年的调地工作!”

显然,这算不上“豪言壮语”,也许更多的还是“低调”。私底下,刘梅元还要“保守”得多。鉴于村里十分复杂的局面,他对于自己这个书记能否干长,也没有足够的自信。但他打定主意,即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也要把钟撞响!

几句朴实无华的话,掀开了粥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。

重塑粥店

1.第一笔捐款

粥店村西有河,名畔河,发源于泰山西麓,宽约百米,自北向南流60华里,注入大汶河。水流长年不断,雨季河水暴涨,便会阻断行人,村人耕种、客商过往均极为不便。至清中叶,本村石匠姜桂松捐资修建石桥,名曰“通西桥”,粥店始成“通衢”。史载,姜公“不知书,以攻石起家,豁达好施,于贫乏多所赈贷”。相传,通西桥建成后,也有人说,姜石匠修桥不为别人,单是因为自家的地在河西,修桥只是为了自家耕作方便。姜石匠也不分辩,继续“攻石集资”,陆续又捐资修建了大汶河漫水桥、司家庄桥(又名广济桥)、三里庄桥,均有石碑为证。修桥石料,系几里外的枣行村所出,现枣行北有一片山坡仍叫姜家石窝。姜石匠后来被誉为“姜善班”,进入了泰山的光辉史册。

此时,刚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刘梅元漫步桥上,可谓感慨良多。2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,“不知书”的村民姜善班即有此几大善举,时至今日,绝大多数人早应该“知书达礼”,为何村子仍乱得几乎无法收拾?光滑的石板桥上车辙深深,一项善举,方便百年多少人?他记得,9岁上学那年,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专门给他讲过一个寓言,具体内容他已忘了,但寓意却深深刻在心上:人活着,要先为他人着想,再为自己着想。那时,爷爷所在的互助组,就在他家里办公,仓库也设在他家,爷爷的寿棺,用来盛了互助组的种子。仓库从不锁门,也从没丢过东西。(当时的会计刘广汉说,刘家三代他都知道,都是公认的忠厚人。)如此深厚的民风哪里去了?如何才能重树村风,唤回曾经的淳朴?

刘梅元苦苦思索着……

1997年4月12日下午,村民、家具厂承包人赵泽奎、孙继林将1996年奖金捐献给了粥店小学和幼儿园。赵泽奎捐出全部奖金1000元,孙继林捐出全部奖金200元,另外当场多捐300元,共捐500元。

近几十年来,粥店村第一次有人无偿捐出如此“巨款”,刘梅元感到,这是一次重树村风、再塑粥店新形象的大好良机,便邀请了办事处倪庆军主任、宣传办张继峰、教育组孙新财来村里举行捐赠仪式,刘梅元及村委成员姜兴国、丁林香、王安荣及粥店小学校长梁传义一起参加。

当赵泽奎、孙继林分别将捐款双手递给梁校长时,大家热烈鼓掌。

此次活动拉开了粥店无偿捐资的大幕,从那时至今,粥店村每年都举办一两次捐助活动,无偿捐献已成为粥店人的时尚。村里用所捐资金设立了救助基金,随时救助需要的弱势群体。

2005年,姜公桥曾被洪水冲垮,粥店村投资8万元重修。历经岁月磨洗的石桥,又加进了新一代粥店人的义举。

2007年,姜公桥被列为泰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其实,更重要的,石桥蕴含着一段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感,称之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或许更为恰当。

此时,粥店也已脱胎换骨,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文明村”了。

2.“村约”发威

无处不在的粥店乱象,让很多正直忠厚的粥店人揪心。刘梅元分析,村子之所以乱,是因为少数人只从一己私利出发,任意而为,而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,对于违法乱纪的事,村干部睁一眼闭一眼,平头百姓就更没理由管了。正直的村民对违法乱纪的人有意见,对村干部更有意见。

坏的风气得不到抑制,好的风气难以形成,村里的各项事业就得不到健康发展。而要根治多年的痼疾,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,除发动村干部、党员率先垂范外,还必须有一部考虑到严密而又切实可行的“根本大法”。

1997年3月22日,到任一周的刘梅元主持召开村党总支会议,当众宣布,书记工资按上级规定是404元,他仍旧拿380元;其他两委成员、工作人员按规定分别上调。针对村里工作人员作风拖拉、不按时上下班现象,实行全天候考勤,规范工作制度,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;严格控制招待费、办公费支出,厉行节约;讨论通过粥店村基层组织建设计划,决定本年度培养村民梁传法、梁兴海、梁晓等3名入党积极分子;讨论并通过1996年3月31日由村民代表与村委共同讨论的《村规民约》——套治理粥店村的规章制度诞生了。

同时,连夜分别召开党小组长、全体党员、村民代表大会,学习党章及有关廉政政例,严肃党的纪律,重树党组织和党员威望,鼓励全体党员做好经济发展的带头人、全体村民的表率。

对好的风气大张旗鼓地宣传,坏的风气则严格执行《村规民约》,以铁的手腕对付那些违法乱纪之人。

“村约”规定,禁止在河道以外的任何地方挖沙。一村民违反规定,刘梅元亲自找到他,跟他谈村里的规定,他羞愧地停止了,并按要求恢复了地貌。

为制止村民互相攀比房高的陋俗,“村约”统一规定了房高,超出者予以罚款或自行拆除。但仍有部分村民不予理会,

随意超高建房。村里组成测量队,由周庆贵、姜兴国亲自带队,实地测量疑似超高房屋,发现有几家新建住房超高,责成这几户自行拆除。

一果农未经允许在北果园挖蓄水池,村里集体研究形成处理意见:损坏果树按《森林法》有关规定处罚,果树按年产量50斤计算,按3倍处罚,每损坏一棵责令其补栽两棵。蓄水池按面积增加承包额,即每亩水面每年100元。法制面前,该果农坦诚认罪。

有少数不孝子女打骂老人(有一人与老母亲争执某事,竟拧断了老母亲的胳膊;一老人下跪向儿子索取养老费而不得),拒付赡养费,这也违背了“村约”,村干部找上门家,勒令该不孝子到村里,严加批评,耐心说服教育,直至子女给老人道歉,如期如数交上赡养费。如再违犯,就要张贴上墙,暴露在全村老少爷们眼前。人要看脸面树要皮,老少爷们跟前脸皮厚了能对付过去,还有孩子呢,孩子还有同伴、同学呢,孩子因此受了歧视,在同龄人面前抬不起头,那就剜了爹娘的心头肉了——不得不含羞改正。

对欠村里果园、鱼塘、企业承包费的,由周庆贵、姜兴国负责,派村里得力人员一家一家催交。现任村委委员王安荣当时是“第一清欠人”,原来一些承包户,觉得承包是集体的事,总想找各种理由少交点钱,要不就拖着不交,似乎谁拖的时间长谁有能耐。按规定准时交的,倒成了傻瓜蛋,成了一些人耻笑的对象。现在不行了,你如不按时交承包费,又无正当理由,村里立马与你中止合同,与别人另行签订。承包毕竟有利可图,谁也不会眼见自己碗里的肥肉落在别人手里,又看到村里一视同仁,都顺当当地交齐了拖欠的承包款……

此后,随着社会、经济的发展,《村规民约》多次重新讨论,重新修订,既约束着村民的行为,又是村民的保护伞。

3.旧貌新颜

集体收入回笼后,村里有能力为村民服务了。

投资改建,扩建了卫生室,修缮、绿化了学校、幼儿园;美化、绿化粥店河两岸,昔日旧河道,成为粥店村一条风景线;

整顿村容村貌,清理路旁垃圾、粪坑、柴草、沙石等杂物,主要街道路面硬化;

治理小东河污染,让两岸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的村民用上放心的自来水;

新上100KV变压器,不再因用电超负荷经常停电了;

同时,他们还多方筹措资金,购置6台打麦机及一批农业机械,无偿为村民打麦子;投资数万元,购置水力设施,免费为村民浇地。稍后,村民的“三提五统”、医疗保险也由村里统一支付,免除了村民的所有负担。

老年节为村里60岁以上的每位老人发一条毛巾、二斤白糖,虽是送鹅毛,礼轻情义重啊!

那些日子,刘梅元和村委一班人,可谓“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”,上午还衣冠楚楚在会议室主持教授们的讲习班,下午就光着膀子来到地里,和村民一起抬电杆,架电线,修水渠,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刘梅元至今还记得,一根电杆六七百斤重,几个人一下午不停手,晚上回家累得腰酸背疼,饭都不想吃了。

此时,刘梅元家中还种着7口人的地,除他一家5口,还有母亲、弟媳的,一共4亩多,有些地块畚,还得要自己。他是家里的主劳力,得先把集体的事干好,才能回家干自己的,麦秋两季,抢收抢种,累得要死。那时,村里还处在拨乱反正期,有些村民因为浇地、打麦等琐事,一不合适就吵架;还有时停电或者机器故障,有人来喊,他都得扔下自己正干的活路去处理好,回来才继续干自己的……

刘梅元对我感叹道,那时下了多少力啊!

年底,评选出“文明户”、“好媳妇”、“好婆婆”、“科技致富能手”,村里的锣鼓队敲锣打鼓把牌匾和奖品送到家门,引来多少由衷的赞叹和羡慕的目光。

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。

无论村庄外部形象,还是粥店人的精神风貌,都焕然一新,再也没人说粥店是“猪圈”了。

这是刘梅元治村迈出的可喜一步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,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,村民思想观念还会不断变化,刘梅元和村两委注定还要经过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。

公道之地

1997年早春,田地边头的野草还没冒绿芽儿,一场关于土地的话题已在村里暗中议论多时了。其时,土地承包是三年一小调、五年一大调,粥店属于丘陵、平原交叉地带,土地有肥有瘦,肥的地插上根拐棍能发芽;瘦的地,你就是像伺候亲老子一样,它也不领情,硬着心肠不给你回报。对于庄稼人来说,能够承包一份好地,等于交上了好运,似那平地里捡到了金子;如果承包了瘠地,则无异于交了恶运,丢失了宝贝,一连几年都会感到窝心。

所以,为了承包到好地,就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一个几千人的大村子,家族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,内中亲疏远近又各不相同。大权在握的村、组干部便成了全村瞩目的焦点,调地前,请客的、送礼的、拉关系的,挤破了干部的家门。调地时,有人如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照顾,苦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,眼看着一些上蹿下跳的人承包到了好地,而自己名下却是一些边角余料,心里那个火啊!还有人分到的地不如愿,抱怨村里不公。于是,告状的、吵架的、骂人的,撸袖子攥拳头找村干部打架的……乱哄哄一盘散沙。

以前,几乎历次调地都是如此。

现在,村里新换了书记,还会像以前一样吗?村民都在拭目以待,有些脸孔精灵的人又像从前一样开始四处“活动”了。

很快,这些到处“活动”的人都碰了“钉子”,带回来的消息是,今次调地大不同于往年,村里已经组织人马,将每块地估产后,按高产和低产两种,再根据各组人数,分别搭配编号,最后由每家代表抓阄,抓着哪块是哪块!

消息很快不胫而走,村民们将信将疑,空气中充满了期待的味道。

果然,村子显眼处张贴了几张大红“告示”:全村所有地块都标着号,似在等待大家认领。“告示”说,如有何意见,可以到村委提出,如无异议,三天后,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,按此标号抓阄决定各户承包地块。这个办法可真公正,也真新鲜!告示前,挤满了张眼观望的村民,大家评判着,争论着,感叹着,总之一句话,新村官要有“真事”了!

还有更令人叫绝的,正式抓阄前,先抓顺序号,按抓到的号依次开始抓“地块”,这样,等于又加了一层“公正”的保险。

几天后,全村12个村民小组顺利完成了调地任务,面对自己名下新的承包地,村民们心服口服,反觉得以前为分地打架斗殴的丑事恍如隔世了。

如此强有力的举措,如一阵大风,吹散了多年来笼罩在村民头上最厚的阴云,晴朗的天空下,村民们甚至觉得喘气也比

以前匀和了。

还是原来的土地、原来的村民,只因采取了公正的办法,效果竟有天壤之别!

当然,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。

时至今日,参与当年分地的居委会副书记姜兴国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:“当时分地,比现在征地还难,调这儿不合适,那儿不合适。有的骂骂咧咧,甚至想揍人。我带着一个组,周庆贵(现居委会主任)带着一个组,先摸清地块,哪个好,哪个畚,甚至一块地里也分出畚好;再定产量,把整个地里全部情况摸起来。你这个组里,总的人口是多少,应分多少产量,哪块地多少产量,得分多少块。然后再召集全体村民,说明情况,每个号都是两块,一个好一个畚,然后张榜公布3天,没疑义,就开始分了。从开始到分下去,我带的组分了4个生产队,200多户,有八九百人的样子。大约得分将近20天,分的时候倒快,但前期熟悉地块、定产、摸情况,得5个多月,你想想,全村近3000人,3000多亩地,这样一块块标出来,分下去,得多大的工作量!”

在刘梅元任期内,这样的调地共有三次,每次都要几个月甚至半年。刘梅元和班子成员们,从一开始就坚持这样的理念: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,不能怕麻烦,不但要有担当的勇气,还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。

一家人的田园

在村西北坡,有一片荒地,大约六七亩的样子,原属生产队,因是丘陵,土薄石多,又无水井,基本靠天吃饭,也没有路,不适于耕作。长期下来,便成了荒地,村里收上来,对全村招标承包,价低到每亩60元,愣是无人问津。村里找到几位种田能手,力劝他们承包下来,还是无人应承。眼看着种植季节将到,身为村主任的刘梅元自告奋勇,将这片区承包到自己名下。他还做出一个令人不解的举动,自愿提出加价40元,每亩60元没人要的地,他竟然出到了每亩100元!

村里人都知道,刘梅元也是种田能手,他种的小麦年年丰收,每年打下的2000多斤小麦,总是早早就被街坊邻居抢着换做麦种;自家产的颗粒饱满,换回来的却是又小又瘪,刘梅元也不计较,反而有点小小的成就感。村民们不知他有个种麦的“诀窍”:美国的免耕法,是他从《参考消息》上学来的,省力又高产。不过,这个法子他没公开,一是说了别人也不信,二是也怕别人说他懒啊。

这次包下地来,刘梅元没有搞传统农业种植,而是率妻子、儿媳、闺女一齐上阵,平整土地,栽上苹果、油桃、日本葡萄等果树,又从废品站购来废钢、铁材料,建起塑料大棚,种上草莓、姜、西瓜等经济作物,自然,全部选了优良品种。平时,妻儿坐阵,他忙村里事顾不上,只得早起晚归,上班前忙一阵,下班后忙一阵。家人辛辛苦苦,精心侍弄,把片荒地弄得花团锦簇,生机勃勃。随后,刘梅元又建了几间平房,一家人索性搬到地里,以果园为家。北边不远就是储水几千万方的大河水库,空气清新湿润,混合着花香、果香、土香,沁人心脾。他是有建筑专家,建平房时,留出了增建二层的余地,他想等果园有了收入,就把二层建起来,到时把家当全部搬来——这一切连同念想都令刘梅元陶醉。他心里还有个“小九九”,就是马上又面临换届选举,到时就辞了主任,回家专心务弄这片园子,那该多么开心和惬意?

不料,1998年换届选举,刘梅元不光没能辞职,又被选为村书记兼主任,一肩挑两副担子。他感到责任重大,硬是辞去了主任一职,由周庆贵担任。

转眼几年过去,园中果树早已挂果,各种蔬菜长势喜人,一家人沉浸在即将收获的喜悦中。

2000年秋天,一纸通知突然下来,岱岳区委将要在此征地建设区政大楼,他们的果园全部在被征之列,刘梅元的“庄园主”梦被强行打断。

此前,作为村支书的刘梅元早已知道确切消息,他完全来得及将开始规划划好的二层楼建起来,拆迁时,一层每平方米补助120元,二层240元,他可以多得到两倍的补偿。

一些提前得到消息的人都这么做了,但他没有。

按有关规定,刘梅元得到了十几万元补偿,他大略算了算,已超过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投入,当即决定,拿出5000元钱资助学校和幼儿园!这笔款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他得征求妻子、儿媳、闺女的意见,这些年,果园主要由她们管理,她们出力流汗,操心最多,这笔收入应该她们说了算才是。正如他所预料的,她们一致同意,支持他的想法。

第二天,刘梅元将这笔款子交给了小学校长,嘱他给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添置些书籍、学习用品等,校长捧着那沓沉甸甸的百元大钞,激动得只顾连连点头,都忘了说句感谢的话。

从人见人烦的荒地,到花果茂盛的果园,再到土地意外被征,获得应得补偿,再拿出一部分捐助村里公益事业,刘梅元甘于吃苦、乐于奉献的精神,恰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,做人的辩证法,奥妙不言而喻。

也许从中得到启发,几年后,刘梅元又为村里争取了一块一般人看来无甚价值的300亩荒地。没过几年,这块地同样炙手可热,为村里带来巨大的收益。

教授到咱田间来

漫坡的苹果树开花了,花香弥漫,根据经验,今年将是一个“大年”,苹果会获得令人欣喜的丰收。

粥店村有果园近700亩,习惯上,分为北果园、家北果园、南果园、新果园。这天上午,春风习习,凉爽宜人,村里请来了山东果科所专门从事果树研究的专家,一位是尹姓教授,另一位是温姓专家。两位专家来到村里,也没到办公室,直接由刘梅元陪着去了北果园,早有果农迎上前来,握手、寒暄,接着是咨询和解答。

一位果农拉着两位专家来到一棵粗壮的果树前,果树枝繁叶茂,但去年却没有得到理想的收获。果农问,为什么?专家耐心地指导:某些品种有“大小年”现象,消除办法是,修剪时把过多的结果花芽剪去,春天疏花疏果,增施有机肥,秋季或明年春天嫁接部分优良品种。移植部分较大的果树授粉时,可采取人工授粉,以观效果;果树的病虫害防治关键是把握好时机,使对工人授粉;……

又过了一个月,两位专家再次来到粥店,全村领导和果农早已恭候在会议室了。这是刘梅元召集的一次“果园管理座谈会”,主题是在:如何提高苹果的果品质量。面对两眼放光的求知者,两位专家侃侃而谈,从喷药定果型、光照上色到如何减少药物污染,从预防蚜虫如何用药到用何种药能达到最佳效果;谢花幼果期纹状病初发,干旱天气可减少病菌发病,“金帅”谢花后应多划锄,以形成低湿度空气的小气候……现场问答,现场操作。

(摘自《天地之间:一座失地村庄的科学发展报告》,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)